深厚的中国文学情怀

——倾听郭文景

任海杰

德奥音乐的影响力为什么在全球经久不衰？这是因为他们有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布鲁克纳、马勒、“新维也纳乐派”，直至当代的贝尔恩德·齐默尔曼、亨策、施托克豪森……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要立足于世界之林，第一重要的是原创作品，是一流的音乐大家。在我所关注的中国当代作曲家中，郭文景就是非常独特的一位。

那是好多年前了，我在“上海之春”聆听中国当代作品音乐会，许多作曲家的名字对我来说还是陌生的，我是完全根据自己的现场感觉来聆听，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头脑里毫无条条框框和任何的先入为主。记得当时有一首作品不经意间感动了我，尽管那还只是一部交响曲的一个乐章（整部交响曲当时好像还没有完成。我不知记忆是否准确）。由此记住了这位作曲家：郭文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

我后来持续关注中国作曲家的原创音乐，上海只要上演新作品音乐会，我都会尽可能地去现场聆听，并发现一个现象：尽管作品各有千秋，有的在世界乐坛也获得赞扬，但几乎都有受到西方当代作曲技巧和音乐理念影响的痕迹（关于这个问题，涉及面太广，在此不作展开）。郭文景的作品虽然也运用了现代作曲技法，但总体风格最“中国化”，最具中国气派中国精神。最近国家大剧院出版发行了郭文景声乐作品专辑《天地的回声》，又给了我们了解郭文景创作风格的一次难得良机。

这是2016年11月26日中国国家大剧院的现场录音，由新生代指挥家夏小汤、焦淼、陈琳执棒中国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作品创作时间从1987年的《蜀道难》，到2016年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几乎是郭文景三十年声乐创作的一个回顾、总结和缩影。《蜀道难》（李白诗，为男高音、合唱与管弦乐队而作）虽然创作于三十年前，现在听来依然气势磅礴、元气充沛、震天动地！男高音王传越的三声长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抑扬顿挫、层层推进全曲的进程，仿佛是一位英雄带领众人（合唱）呐喊着向艰难险阻的巍峨高峰攀登。全曲的节奏先缓后疾、先抑后扬，至“剑阁峥嵘而崔嵬”进入快速冲刺，气势如虹，一往无前，直达巅峰！极具画面感，令人联想到理查·施特劳斯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

《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选自郭文景的歌剧《诗人李白》。好多年前，我曾在上海大剧院观赏过《诗人李白》的全剧（张国勇指挥上海歌剧院管弦乐团），这是部很有特色、非常成功的歌剧。选曲先由男低音关致京演唱“云想衣裳花想容”（四句），合唱弱声以次跟进，然后再由京剧小生李宏图“闪亮”演唱，男低音的低沉深厚、京剧小生的高亢明亮，就像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一唱一和，卿卿我我，尽显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柔情蜜意。为无伴奏合唱与一个打击乐队而作的《天地的回声》，表达了作曲家“上天入地，包容万象”的宏大超越的境界，其中既有芸芸众生默诵的“大慈大悲”，也有《金刚经》中的“一切有为法”、藏传佛教六字真言、列子的“可以生而生”、当代诗人西川的“我的精神已登达山顶”。他们包融互渗，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参差并进，升华至崇高神圣之境。此曲技巧高，演唱难度也高，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尚有进一步上升完善的空间。

因为是现场录音，难免会有瑕疵，这可能涉及二度演绎与一度原创之间的关系。《春天，十个海子》（为女高音、两架竖琴与管弦乐队而作）中，女高音宋元明的演唱有些“音包子”，两架竖琴的声音也几乎听不清。比较而言，《远游·布满伤痕的肉体啊》（西川诗，为女高音与管弦乐队而作）中，女高音阮余群的演唱通透清晰，情感充沛，充满戏剧张力。《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改编自郭文景的歌剧《夜宴》），全篇演唱的是南唐后主李煜的那首名词。身为一国之君，却遭遇国破家亡、沦为阶下囚、朝不保夕的极度痛苦之境，这样的情感是极度私人化的，用合唱来表达，是否合适？

行文到此，读者诸君已经看出，唱片中的曲目都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学有关，可见郭文景深厚的文学情怀。如果他不作曲，很可能会是个文学家。文景——文学的风景呵。唱片最后甚至还附录了郭文景诵诗录音，分别是海子的《春天，十个海子》、西川的《远游》（节选）、李白的《蜀道难》。其中的《蜀道难》，郭文景是用四川话朗诵的（郭文景祖籍四川），真正的原汁原味了。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郭文景所有声乐作品的文字，都是中文。包括他创作的歌剧，也全部是中文。这种面对世界潮流而毫不妥协的以我为本的精神，难能可贵，令人尊敬！这又让我想到了捷克作曲家雅纳切克。

在郭文景那一辈著名中国作曲家中，只有郭文景没有留学西方的经历，现在看来，这未尝不是件好事。

乌庄头缴租背后

陈大康

《红楼梦》展现了贾府的奢华靡费生活，但这背后靠什么支撑？靠工资肯定不行。贾珍、贾赦贵为公爵，岁支俸银仅七百两，遑论从五品的工部员外郎贾政。于是，第五十三回出现了与先前情节无关、与大观园的诗情画意也不相配的乌庄头乌进孝缴租，还详列各种物品及数量。其间，贾珍的“不和你们要，找谁去”，显示了他们的主要收入是庄田，那句“你这老货又来打擂台来了”，表明庄田又未完成缴租预算。贾珍期望“至少也有五千两银子来”，但只收到“外卖粱谷、牲口各项之银共折银二千五百两”。他刚花一千五百两熔铸金锞子准备过年时送人，接下来还有“年例送人请人”等开支，只收到这点银子，难怪要说“真真是又教别过年了”。

现金收入当然不止这些，宁府有八九个庄子，荣府有八个，若以黑山村为准，靠秋租各可收二万两银，但这点银子根本不够。荣府各类食材基本来自庄田，新鲜蔬菜却得现买。为宝黛诸人方便，大观园特设约四十人用膳的小厨房，每日购买蔬菜标准是一吊钱，全府四百人应是十吊，折银十两，全年三千六百两。又如月钱，二门内由王熙凤发放，每月共三百两，全年三千六百两。荣府管理机构多在二门外，大小管家甚多，且“主子有一全份，他们就得半份”，再加上众多奴仆，月钱总数至少得翻倍，这开支一年就得用去万余两，而年终与节日发放的年例与节例也是大开销。府内实行供给制，连丫鬟服饰也按“分例”统一发放。晴雯六岁进府，十六岁病逝时“剩的衣履簪环，约有三四百金之数”，袭人是一等丫鬟，口气更大：“戒指儿能值多少？”试想，每年这上面的开销又将会是多少？荣府日常开销的名目举不胜烦，仅以上几项，二万两银子已不够用。这里还没提及场面上的应酬，仅与宫里打交道，“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

如果其他庄田都像黑山村那般缴租，不仅导致现金严重短缺，贾府还会陷入实物过多的麻烦。租单上“下用常米一千石”合十二万斤，此外碧糯等都是五十斛，又有“杂色粱谷各五十斛”，若只算三种，那也得有一万八千斤（一斛合六十斤）。可是荣府有四百人，合下来也只是每人每天约一斤。女性主子和丫鬟食量很小，刘姥姥曾惊讶地说：“我看你们这些人都只吃这一点儿就完了，亏你们也不饿。怪只道风儿都吹的倒。”男性奴仆、干粗活的丫鬟以及“抬轿子、撑船、拉冰床”的婆子食量要大得多。为表示宽柔待下，贾府月米发放超出了各人的实际消耗，藕官等人曾埋怨那些干娘：“只算我们的米菜，不知赚了多少家去，合家子吃不了。”秋租交来的粮食恐怕还不够一年之用，但九月还有春租，一个庄田两季缴租，可满足贾府粮食的充裕供应。

另外七个庄田显然不能再送粮食，否则每年剩余约百万斤粮食无法储存，何况这过程还会每年重复。而且，即使仅算秋租，八个庄田的千余头猪、羊等牲畜，近五千只家野禽以及几十万斤炭都将潮水般涌至，持续个几年，大观园里将尽是些牲畜家禽，再无“仙境别红尘”或“秀水明山抱复回”的诗意。这些实物不能在京城发卖，贾府是皇亲国戚，又是武荫世家，开店做生意，祖宗颜面何在？京城又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聚集地，他们也在收租，也有实物储存问题，如果都在京城发卖，那么不仅没有销路，朝廷的神圣与威势也将荡然无存。

实际的解决方式是指定某庄田(如黑山村)以按需缴纳实物为主，其他庄园都缴银，故而作品中又称庄田为“银子产业”。刘姥姥一进荣府时，周瑞就已去南方督办租银缴纳，当收大于支时，那些银子就存入当地钱庄。第十六回讨论贾蔷去江南采办时，赖大就说：“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先支三万。”以这样的缴租模式，贾府收取的地租中，实物价值占比还不到百分之十。封建时代地租经历了劳役、实物与货币三个阶段，封建社会末期收取货币地租是很正常的现象，所谓贾府收取实物地租实是一种误判。

贾珍指望“至少也有五千两银子”，乌进孝只交了一半，而荣府收成更是“大差了”。那年的元宵夜宴似未受影响，大家酒也喝了，笑话也讲了，炮仗也放了，还撒发了许多赏钱，但如此气氛的宴会已是最后一次。第七十回又写过年，这次只用“年近岁逼，诸务猬集”一句带过，其后的故事则证实，这年缴租的情况仍很糟糕。收入减少从根本上钳制住了贾府，其生活格调与氛围因此而变化。贾琏居然已没钱筹办中秋家宴，靠央求鸳鸯偷出贾母用不着的金银家什去典当。这次家宴的基调也与以往迥异，是“凄凉寂寞”，正与宴中那缕“呜呜咽咽，袅袅悠悠”的笛音相呼应。王夫人要操办贾母生日庆典也没钱了，“急了两个月，想不出法儿来”，最后变卖四五箱“大铜锡家伙”才应对过去，而刘姥姥二进荣府时，她一出手便送一百两银子，何其慷慨。危机的阴影也显示于饭桌，贾母喜欢吃完后拉别人来接着吃，她则“负手看着取乐”，如今她惊讶地发现，尤氏等人吃的是寻常白粳米饭，而不是红稻米粥。王夫人解释说：“这一二年旱涝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这几样细米更艰难了，所以都可着吃的多少关去。”红稻米即租单上的胭脂米，只交来二石（二百四十斤），这点数量在荣府只能专供贾母消费。宁府情形亦是如此。当年贾珍委托王熙凤料理秦可卿丧事时特别关照“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只要好看为上”，那副檩木棺材就花了一千两银。可是父亲贾敬死时，却已是各项开支银库“竟不能发给”，连支付五六百两银子也得靠暂支挪借才勉强应付。

现实逼得人们正视家族的经济问题，连黛玉都说：“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答：“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这颇能反映一些主子心态，而黛玉“每常闲了”不是看书作诗，却在算计贾府的收入支出，似也可说明危机阴影的浓厚吧。王熙凤的认识更深一层：“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荣府“进的产业”在减少，宁府的贾珍也在为“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而发愁。为了解决缺钱的难题，王熙凤“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但她的权限只限于二门内，而且以保障自己与贾母、王夫人等人的利益为前提。压缩开支的措施引起了普遍不满，兴儿就批评她“恨不得把银子省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说他会过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他讨好儿”。王熙凤知道“没个不背地里恨我的”，因此欣然支持探春兴利除宿弊，借此转移众人的怨恨，同时也确实希望稍缓经济的困境。

探春改革的描写有整整一回，行文间透露了作者的赞赏。她“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打扫人等的工费”，免去“各处笤帚、撮箕、掸子并大小禽鸟、鹿、兔吃的粮食”的开支，只是属节流一类，并未增加收入，平儿对改革结果的估算也颇使人泄气：“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两银子。”这区区小数对迅速下滑的荣府经济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探春方案的实质之一，是要账房、买办房等管家让利，可是省下的银两仍归他们掌握，那些管家“那一位是好缠的”？荣府掌管账房的林之孝针锋相对地也提出方案：“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开恩放几家出去。一则他们各有营运，二则家里一年也省些口粮月钱”；第二，“如今说不得先时的例了，少不得大家委屈些，该使八个的使六个，该使四个的使两个。若各房算起来，一年也可以省得许多月米月钱。”这也是节流，但力度与效果都远大于探春的改革。其实质是维护管家利益，第一条是要求给管家以人身自由，第二条是要求主子省俭，故而该方案刚一提出，就遭到王夫人断然否决。

作者在开篇处借冷子兴给出“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考语，但他笔下荣府的日子仍是花团锦簇，空气中荡漾着欢声笑语，较大的波澜只掀起过两次：赵姨娘买通马道婆作法暗害宝玉与王熙凤，与贾环进谗致使宝玉挨打。两次图谋家产的诡计都是暗中使坏，整个家族在表面上仍洋溢着天伦慈孝、其乐融融的气氛。第五十三回后气氛日益峻冷肃杀，经济窘迫使先前潜伏的各种暗流开始汇成汹涌波涛，“各处大小人儿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处”，抄检大观园是矛盾的一次大爆发。不屑卷入钱财纠纷的大观园诸人，对生活的感受也在变化。愤激的探春说破了残酷真相：“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宝玉放眼所见是“轩窗寂寞，屏帐翛然”的“寥落凄惨之景”，黛玉作《桃花行》归结于“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后更吟出“冷月葬花魂”，虽被批评为“颓败凄楚”，却是真情实景，家族行将败亡，精神生活再清雅飘逸，也摆脱不了阴影的笼罩。

王熙凤曾两次提及贾府的经济根基庄田，她建议将喝醉了酒骂主子的焦大“打发他远远的庄子上去”，又下令将柳五儿“立刻交给庄子上，或卖或配人”。府中下人是奴隶，主子“宽柔以待”是为了自己的体面，庄田农奴的生活可就凄惨了。发配庄田是府内的严厉惩罚，庄田的生产效率也不难想知。贾府的庄田连年歉收，身为农民的刘姥姥家却是“多打了两石粮食，瓜果菜蔬也丰盛”。生活在商品交换发达的封建社会晚期，根基却是早期的农奴制，这样的经济体系不崩溃才怪呢。连年歉收使贾府奢华生活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府内的分配制度也受到了冲击，使潜伏着的经济危机终于表面化的正是乌进孝缴租，它看似与情节无关的突兀，却是全书基调发生重大转折的前奏曲。

笔会谈艺录

阳朔道中

（国画）

张安治

他真像高高的红枫

——记与牛汉先生的一面之缘

李成

我实在想象不出，牛汉这样一个高大的北方汉子、诗坛上的著名人物跟我们桐城会有什么关系，但是有的，他是我们桐城人的女婿，他的夫人吴平是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家、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吴汝纶先生的孙女。吴汝纶在我家乡可是家喻户晓，他做过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总教习，他创办的桐城中学至今仍是皖中的名校。

牛汉体魄强健，身高应在一米九以上，我怀疑古今诗人都难出其右。他有蒙古族血统，但出生于山西定襄的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当过北京大学旁听生，后回乡任教，会写诗，爱吹箫，也就是说很有艺术气质。自小在雁门关下长大，牛汉跟一般农家子弟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他的根是深深地扎在家乡的土地上的，这使得他对于这片土地饱含深情，并因目睹太多苦难而养成忧郁的气质。他凭借老天赋予的一副结实壮伟的身躯，就像一株大树穿越几十年硝烟、风雨，历经无数磨难，一直屹立不倒。在干校里劳动，他总是拉着几百斤重的车子打头阵；形势稍有好转，就重拾诗笔，将心中的感喟诉之于如瀑流一般跌宕倾泻的诗行：

湖边山丘上
那棵最高大的枫树
被伐倒了……
在秋天的一个早晨

几个村庄
和这一片山野
都听到了，感觉到了
枫树倒下的声响
……

伐倒了三天之后
枝叶还在微风中
簌簌地摇动
叶片上还挂着明亮的露水
仿佛亿万只含泪的眼睛
向大自然告别

哦，湖边的白鹤
哦，远方的老鹰
还朝着枫树这里飞翔呢

枫树
被解成宽阔的木板
一圈圈年轮……
涌出了一圈圈的
凝固的泪珠

泪珠
也发着芬芳

牛汉写这棵枫树不仅是自况，也是一代知识分子整体的象征。这首《悼念一棵枫树》便成为“归来者”中最能打动人的诗作之一。他的同期名篇还有《华南虎》《半棵树》，歌咏的都是穿越炼狱之火而不死的精魂。

我自习诗以来，就喜欢读牛汉的诗。最初是因为他的散文化的诗句看上去易懂，也容易模仿——但无论怎么模仿，就是达不到牛汉诗的浑然大气和震撼人心。这是自然的，一棵幼树怎模仿得出嶙峋老松的苍劲呢？在大学时代，我还喜欢看他担任副主编的杂志《中国》，上面的作品都比较有新意也有锐气。他主编的《新文学史料》，更是一本为作家、读书界朋友所喜爱的刊物。但是，我那时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和牛汉见面，跟他说上几句话。

说来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我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手头正编着一位青年诗人的诗集。作者是我的学长，一度是新时期风起云涌的校园诗人中的佼佼者，曾到鲁迅文学院读书，指导老师当中就有牛汉先生。牛汉老师对他无疑是欣赏的，在《中国》上以较大篇幅发表了他的一部中篇小说，可谓是一种非常的知遇。这天下午，这位学长来到我的工作单位，一见面就跟我说：走，跟我去见见牛汉先生。我略略有些吃惊，不知这是否妥当，但我也十分想去看看先生，于是抱着忐忑的心情一同前往。

我们乘一位朋友的车子出发，到达牛汉先生的住处——朝阳十里堡某个社区一座砖楼——时，已经暮霭沉沉。叩门，来开门的正是诗人本人。高大的身躯，背微微有点驼，顶着一头凌乱的花白头发，长形的脸庞早已刻上了一些皱纹，眉头还微微地打着结。他把我们延入那亮着灯的客厅兼书房，一边说请坐，一边拿起茶壶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茶水，随即跟我的那位学长说：“你看，夫人病了，我要照顾病人，忙乱得很。”此时看不出他是位诗人，倒更像一位被生活搞得有点手忙脚乱的邻家大伯，我刚才在路上涌到心头的一系列话题，尤其是他和他的夫人与桐城的渊源，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反而为打搅了老人而感到歉疚、不安。

学长把我介绍给先生。稍坐片刻，学长便走到牛汉先生身边，轻轻拉着他的衣肘说：“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件事。”就和牛汉走进了另外一间屋子。我和陪同来的那位朋友待在原地，头顶有一只白炽灯照着。因为无事，我开始打量这屋子。这是一间比较狭小的书屋。进门右侧墙边一溜敞开的书橱，书籍塞得满满，似乎码放得也没有什么规则；靠窗的书橱空出下半截安设了一张书桌，桌上也码放着书刊；桌前是把椅子，此刻正被我坐着。我胡乱想着，牛汉那么多滚烫的振聋发聩的诗句就诞生于这略显杂乱的斗室，就在我身边这张桌子上吧？大约二十多分钟过后，学长与牛汉先生从内室出来了，学长一边说着“就让吴老师安心休养，您老也多保重”，一边向他告别。牛汉先生点点头送我们到门口，看着我们离去。在那一刹那间，我的心里平添惆怅，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这位老人。这时，我才发现学长的手里多了一本书，是牛汉题赠给他的一本散文集《绵绵土》。

我后来没有机会再见到牛汉先生，但十多年来，只要遇到他写的或写他的文字我还是要看的，而且看得比较仔细。跟许多作家一样，家世和童年对他影响很大，他的妈妈生下来就差点被扔掉和后来手握菜刀准备刺杀邻村的阎锡山的经历震撼了我，他把自己的小学课本撕下一半送给买不起书本的同学更让我感动。当然，我也了解到他与夫人的爱情故事——他们在迁至汉中的西北大学相识相恋，经过了战争岁月的考验；在动乱年代，牛汉身陷囹圄，夫人多少年独自抚养儿女，支撑一个家等待牛汉归来。难怪牛汉一辈子对夫人一往情深。据说牛汉夫人是一位长着一双大眼睛的美丽女性，气质高雅，可惜那次拜访，没法问候正在房中养病的她。

我一直庆幸有机会见过牛汉一次。我认为我见到了一直矗立在我心中的那株高高的红枫。

这些绝不能当“主食”

顾农

研究学问以及撰写文章，大体有三种路径，一种是大处着眼，宏观把握；一种是深入微观，精雕细琢；第三条路则是上述二者的结合，当粗则粗，当细则细，把事情和道理弄清楚说明白就算是告无罪于天下。

按说这三者各有所长，皆大有用武之地，而时下的风气似乎特别欣赏越细越好，以致一些关系不大而且说不清楚的小事情，例如什么多情作家学者之三角恋爱红杏出墙的细节，也被当作大事深入地加以研究，以致发生争论；一些遗老遗少的琐碎故事也被当作“掌故”讲来讲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把读者的趣味引向诸如此类的八卦细节有什么意义？即使是严肃的文史考证，也不宜陷入资料的死海而不能自拔。

风气似乎正在走向娱乐，走向琐屑，走向碎片。来一点这样的鸡毛蒜皮以供消遣，茶余酒后随便谈谈，原无不可，但一则不宜过多，二则作者、编者和读者心里都要明白，这些绝不能当作主食来吃；许多乃是垃圾食品、小点心，好处只在于有味道而已。

宋代理学家陆九渊最强调抓住根本，关心大事。他有两句诗道：“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他不赞成朱熹那样重视具体的学问，暗讽他的工作乃是“支离事业”。其实朱熹还是目光远大的，而且也并未“浮沉”，后来成了主流。